

汉语语言学
世纪丛书

陈恩泉 主编

双语双方言
与
现代中国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汉语语言学世纪丛书

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

主 编 陈恩泉
副主编 傅雨贤
 缪锦安
 廖官云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363 13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陈恩泉主编.

-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汉语语言学世纪丛书)

ISBN 7-5619-0670-6

I. 双…

II. 陈…

III. ①汉语-研究-文集 ②少数民族-民族语-中国-文集

③汉语方言-研究-文集 ④少数民族-方言-中国-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8794 号

责任印制: 乔学军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印刷: 北京北林印刷厂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次: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875

字数: 355 千字 印数: 0001-3 000

书号: ISBN 7-5619-0670-6/H·9836

定价: 30.00 元

汉语语言学世纪丛书

序

赵金铭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建勤先生向海内外语言学界名家约稿,得佳作八部,拟编为汉语语言学丛书。我忝列出版界两载有余,得与建勤朝夕切磋。丛书编成,我们不约而同一致认为应以世纪命名,良有以也。

今年是1998年,一百年前,我国语法学的开山之作《马氏文通》诞生,这是我国语法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作者马建忠先生以富国强兵、开启民智为务,首创中国语法学,对后世语法学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不朽之作影响日深日广,今年正好一百年。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传统语言学领域里,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在前辈学者辉煌成就的基础上,溶进了现代语言学理论意识和研究方法,正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语言学的其他门类都有所发展,而尤以汉语语法学为最突出。从初期借鉴西方传统语法体系,到四十年代开始借鉴西方语法理论,到六十年代前后借鉴描写语法学和转换生成语法学,直到本世纪后三十年,汉语语法研究渐入成熟期,国外各种语法理论开始不断影响汉语语法研究,在注重语言形式研究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语言,开始注重于功能分析,于是,呈现了一种多元化的倾向。一个世纪汉语语言学走过的路,应该加以总结。如果以2000年的第一天为进入21世纪,距今只剩下一年多时间,展望21世纪,中国汉语语言学研究如何迎接21世

纪,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进入 21 世纪,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总之,一百年前,《文通》诞生,中国现代汉语语言学肇始,至今一个世纪。一个世纪汉语语言学的发展虽不无曲折,但成绩斐然,实应总结。瞻望下一个世纪,随着世界学术交流的开展,汉语语言学的发展必定前景广阔,十分看好。此三端实丛书以“世纪”命名之初衷。

丛书中收有两部分语言学家的著述,其中境内学者如刘坚、邢福义、马庆株、陈恩泉,他们学术基础扎实深厚,对语言事实观察细密,描写精微,分析入木,秉承一代宗师吕叔湘先生一贯倡导的“强调广搜事例,归纳条理,反对摭拾新奇,游谈无根”,治学严谨。近二十年来,他们在事实描写的基础上,从汉语语言学角度开始对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思考和总结,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另一部分是长期在国外工作或目前在中国大陆之外工作的学者,如王士元、徐烈炯、郑定欧、刘勋宁,他们或接受过西方当代语言学的系统训练,或较多地接触西方当代语言学的最新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并运用到汉语语言学研究之中,从而从别一个角度揭示了汉语的某些特点和规律。这两部分人的研究都深深地植根于汉语,各有所长,各具特色。丛书作者之一徐烈炯有言:“由于理论框架、治学目标和工作语言的差异,国内学者常常难以了解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的理论观点。而国外学者却常常未能充分掌握国内学者收集的丰富语料。”本丛书的出版正在于沟通双方,促进相互交流与了解,使汉语语言学得到更加充分、更加深入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充实语言学理论,为世界语言学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在确定汉语语言学世纪丛书选题时,必先对我国当今语言研究的总态势,把握准确。本丛书作者之一刘坚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一书中曾经指出:“语言学研究的总态势是:现代国外语言学研究的方法不断被引进到我国语言学各个研究领域;语言学各个领域都在努力探索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如何与我国语言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结合’的过程中,就一些局部领域开始

向创新的方向发展;同时,各个领域在不同程度上都注意到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这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教育有关各个方面最为突出。”

总态势呈两种潮流,一种是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在这方面本丛书有如下三部著作:《人与文——忆几位师友论若干语言问题》(刘坚)特别注重虚词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关注在近代汉语时期发展极为活跃的助词系统,通过研究展现了近代汉语语法面貌之一斑,从而总结出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如汉语虚词一般都是从实词经过语法化过程发展变化而来的。《语言的探索·学路历程——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选译》研究视野广阔,打通语言学科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首创“词汇扩散理论”,在世界上引起反响,提出了不少其他理论难以提出的问题。《共性与个性——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徐烈炯主编)挑选了十二个十多年来语言学界最为关注的、讨论得最多的题目,写出综述和评论,包括:该题目的理论价值;国内外出版的有关文献;对文献中重要理论和观点所做的评论。

另一潮流是试图探讨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与我国语言实际相结合问题,在这方面本丛书有以下五部著作:《汉语法特点面面观》(邢福义主编)围绕着汉语句法与汉语特点,或对语言事实进行深入发掘,或从理论上阐述一己之见,反映出语法学者目前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苦心追求与探索。正如邢福义先生所说:“正在多元化地、多触角地开展着汉语语言学研究,以新的姿态面对着更新的未来。”《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马庆株)从汉语语法特点出发,提出与印欧语的形态学语法相对而言的汉语语义语法,从而为摆脱语法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开创一条独具特色的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思路,做了有益的尝试。《词汇语法理论与汉语句法研究》(郑定欧)顺应当代语言学的词汇主义潮流,从词汇语法的核心原则,即“语法规则必须通过词汇的实证检验才能成立”出发,试图以汉语的若干句式作为研究的突破口,为汉语语法研究寻求了一块新的领域。由陈恩泉先生倡

议发起并组织召开的五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在我国语言学界独树一帜,《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陈恩泉主编)使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单方言静态描写的方法中脱颖而出,形成了我国双语双方言动态比较的方法,从而形成了我国双语双方言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现代汉语研究》(刘勋宁)把现代汉语的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熔为一炉。作者浸淫在自己的方言之中,一点一滴地去体味,挖掘出不少值得重视的语言事实。由于多了一个方言参照点,有些问题就更容易看清、说清。

汉语语言学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所憾者至今尚未融入世界语言学的主流。于是,我们不得不反思,差距在哪里?汉语本身是一份丰饶的资源,汉语学者在开掘这份资源的同时,一直在努力寻求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创新之路在于,实现西方语言学与汉语语言学相结合,也就是吸收西方语言理论的精髓,从汉语语言现象的研究中升华出普遍规律和理论原则,提炼出相应的研究方法。本丛书的作者正在做这样的探索,当然,路漫漫其修远兮,探索正未有穷期。着眼于 21 世纪,我国要大力提高全民的文化科学素质。时代不仅要求汉语语言学为语文应用、现代科技服务,还要求语言学者必须尽快地探索最新的理论,使用最有成效的方法,研究汉语语言材料,使汉语语言学获得新的发展,进入世界语言学研究的前列。

本丛书作者有前辈语言学家王士元、刘坚、邢福义、陈恩泉,他们在语言学界声誉卓著;也有同侪语言学家徐烈炯、马庆株、郑定欧、刘勋宁,他们也是英才卓萃。八位先生的大著合为丛书,异彩纷呈。我因参与其事,故略述编纂宗旨,并做概要介绍,是为序。

1998.5

序

邢福义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给“双语双方言”这个概念做一个比较准确的界说。按照我粗浅的理解,“双语双方言”是一个代称,指的是语言生活中双语多语双方言多方言并存并用的现象。

现代中国需要双语双方言研究。当今的世界,一日万里地飞速发展。社会越发达,科技越进步,地球就变得越小,双语双方言的问题也就越突出。中国人,说方言的需要掌握普通话,说普通话的常常会接触方言;说少数民族语言的需要掌握汉语,说汉语的常常会接触少数民族语言。至于方言与方言之间,少数民族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之间,自然也会产生错综复杂的联系。再把范围扩大一点来看,中国人如果一跨出中国国门,马上会接触外国语言,双语或多语的问题就愈加突出。即使在中国国土上,一旦接待外国客人,同样会接触这样那样的外国语言,双语双方言问题同样会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诚然,加强双语双方言的研究,有助于国家的改革开放,有助于提高经济协作的效益和现代科技信息传达的效果,有助于增进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有助于发展教育事业和造就现代化合格人才,更直接地有助于我国普通话的推广和整个语言研究事业的推进。可以断言,双语双方言研究将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而得到发展,如果说历史的发展是无限的,那么双语双方言研究的发展也将是没有止境的。

双语双方言研究需要众多语言学家的参与。在双语双方言研究

领域,无论是理论问题的阐述,宏观现象的解释,还是许许多多具体事实的考察,处处有文章。语音学家,语法学家,词汇学家,方言学家,语言类型学家,普通语言学理论家,以及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专门家,只要一跨进双语双方言研究领域,都可以在这个广阔天地里获取研究素材,找到研究领地。事实已经证明和必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来说,汉语语法学者们已经通过实践逐渐看到:如果立足于现代汉语普通话来研究语法问题,在有必要和有可能的情况下,作为外证,既可以在纵线上联系古代近代汉语的事实进行考察,又可以在横线上联系方言或亲属语言的事实进行考察,从而使研究工作显得更加厚实深入,富于说服力。这样的“三角”研究,实际上已经向双语双方言研究靠拢了。毫无疑问,双语双方言研究能够为各种类型的语言学家提供“竞自由”的广阔天地,让各种类型的语言学家不仅可以大显身手,充分展示聪明才智,而且可以吸取新的营养,弥补原来的不足。

在我国的双语双方言研究中,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当是出现了一个“深圳基地”。1987年8月10日至14日,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在北京香山举行,我和陈恩泉兄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恩泉兄原在武汉大学任教,我们是好朋友,经常见面。后来他调往深圳,见面的机会少了,能在香山相聚,自然格外高兴,格外珍惜。每天晚饭后我们俩都在一起散步,散步时谈话的内容总离不开如何在深圳开展语言研究活动。

恩泉兄是个说干就干的人。1987年3月,深港语言研究所成立,恩泉兄任所长,中山大学傅雨贤兄和香港大学缪锦安兄任副所长,陈章太兄、詹伯慧兄和我被聘请为顾问。深港语言研究所是一个以兼职研究人员为主体的横向联合科研机构,当年12月召开了建所大会暨第一次所务会议。于是,一个双语双方言研究的“深圳基地”便诞生了。

“深圳基地”,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深圳贡献”。深港语言研究所

成立十年来,已经连续举行了五届双语双方言国际研讨会:第一届,1988年8月;第二届,1991年8月;第三届,1993年8月;第四届,1995年6月;第五届,1997年3月。每一届会议之后,都出版一部论文集。在第三届会议的开幕词中,我这么说过:我们高度评价促进双语双方言研究的“深圳贡献”。位于大陆南端的深圳,得天时,得地利,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它向北牵联大陆,往南牵联大陆以外的地区和国家,在语言问题上必然高度敏感,是研究双语双方言问题的一块风水宝地。在深圳举行的系列性双语双方言会议,从语言问题的一个重要角度切入,以深港片语言问题为轴心,持续不断地展开对双语双方言问题的探讨,有确定的目标,有鲜明的特点,在我国语言学界独树一帜。我们把深港语言研究所的成立、系列会议的举行和深圳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统称为“深圳贡献”,深信历史一定会记下这四个大字。在第四届会议的开幕词中,我又这么说过:任何学术事业的开拓和进取,都需要一种可贵的奉献精神。“深圳贡献”,有很多方面的内涵,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方面便是“奉献”。

“深圳基地”,产生了发人深思的“深圳启迪”。在第五届会议开幕词中,我特别强调了“深圳启迪”,提出了个人感受最深的八个字四个语词:献心,有恒,远谋,聚众。一是“献心”。献心于事业,把心扑到事业上。陈恩泉兄便是一位献心于事业的典型代表人物。二是“有恒”。看准目标,实干苦干,持之以恒。五届会议一届接一届地举行,没有变动过地点,没有变动过主持人,长途挑重担,十年不换肩,说明了创业中毅力和韧性的重要。三是“远谋”。立足现实,放眼未来,有深远的谋划,有战略性的追求。这就是:巩固和提高双语双方言区的汉语普通话水平,为正确对待和科学处理双语双方言问题提供理论依据;通过各种实际问题的研究,为我国双语双方言研究总结理论和方法;通过双语双方言研究的理论方法的探索,开拓我国语言研究的新领域。如果说,“献心”是一种精神,“有恒”是一种意志,那么,“远谋”便是一种学术的胆略。四是“聚众”。从自身特点出发,聚

合海内外众多学者,形成强有力的研究力量。曾经有人提问:在深圳这个新的商业城市,在这个缺乏雄厚语言研究力量的地方,能够搞出成绩来吗?事实胜于雄辩。有个常用的四字格,叫做“聚众闹事”,偏于贬义;假若加上一个字,说成“聚众闹事业”,便可以化贬为褒,足以形容今天在深圳“闹”起来的局面,足以证明“事在人为”的警言。

对于“深圳基地”,国家语委主任许嘉璐教授热情洋溢地作了充分的肯定。许先生在给“第五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的贺信中写道:“十年来,双语双方言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是艰苦的十年,奋斗的十年,丰收的十年,也是值得回味和纪念的十年。现在,双语双方言研究已经从以深港为主辐射为全国范围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术大课题,同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我国语言文字管理部门的关注。深圳凭借着她的地理优势和对新事物的敏锐,在全国语言学家的支持下,已经成为双语双方言研究的基地。”这是一段令人深受鼓舞的话。

《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一书,由五届会议的五部《双语双方言》论文集中挑选出一部分论文集结而成,大体上能够反映我国双语双方言研讨活动以深圳为基地辐射式地坚持了长达十年时间的基本状况。“十年”,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一提到“十年”,人们便会想到“十年树木”。一部《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五部《双语双方言》,以及十年活动所引发的积极成果和辐射向四面八方的积极影响,便是“树木”工作的巨大收获。

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曹雪芹题《红楼梦》的一句诗:“十年辛苦不寻常”!

序 言

陈 恩 泉

1987年深港语言研究所成立伊始,就从“深港片语言——双语双方言”这一重要语言问题的角度切入,把它作为长期的科研大课题来开拓研究。为了把双语双方言研究办成一项事业,为了有利于团结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调查研究、进行学术交流、高效获取科研成果,本所办成了一个以兼职研究人员为主体的横向联合科研机构,并采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方式开展工作。十年来,成功召开了五届双语双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5辑会议论文集《双语双方言》;《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的论文就是从这5辑《双语双方言》中挑选出来的。可以说,《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一书,是双语双方言研究的结晶,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前中国双语双方言研究的水平。

双语(双语现象或双重语言制)和双方言(双言制或双言现象)分别译自英语词 bilingualism 和 diglossia^①,是两个不同层级概念的语言学术语。双语和双方言虽然属于语言范畴中的不同层级,但是对个人或语言集团来说,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仅从语用角度考察,个人或语言集团内部就存在着既说母语又说他语或第二方言的现象,甚至除说母语之外还说两种以上他语或方言的现象。就是说,在语用领域,多数情况下不存在“纯双语”和“纯双方言”。一般是把上述这一语言现象称作多语和多方言。但是,语用领域言语交际的情况比这一语言现象还要复杂,用多语和多方言是很难清晰地划分它们的界限的。所以,不是在对双语或双方言进行单独描写、阐述的

时候,我们总把双语和双方言综合起来,称作双语双方言。对个人或语言集团来说,“双语双方言”是一个“模糊语言”的概念,它可能是指多语或多方言,也可能是指多语和多方言交叉使用过程中更为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有如邢福义兄在本书《序》中所说:“‘双语双方言’是一个代称,指的是语言生活中双语多语双方言多方言并存并用的现象。”本文集的论文,原则上就是参照这一“界说”来处理双语和双方言之间的关系。

双语及其研究,在国际上深受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77 年和 1981 年先后召开的语言教学专家会议上,就强调要对双语制进行研究,指出双语制在各国语言活动中是不可避免的。60 年代起,双语问题在我国引起了注意;80 年代,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1979 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1985 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会”),明确地把少数民族语与汉语双语研究、双语文教育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80 年代,不仅恢复而且发展了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是成立了国际性“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切实地把汉语—外国语双语教学与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80 年代是我国双语与双语文教学大发展的年代,而在双语概念及其理论运用方面却仍然是传统式的:限于“语言—语言类型”双语制。中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语言的国家,也是一个多方言(包括少数民族语方言)的国家;有的方言,如果割断其与本族语在内部结构上的历史联系,只凭能否互相通话来衡量,其不能通话的程度并不亚于两种独立的语言,难怪有人把粤方言当成一个独立的语言。属于这一特性的汉语方言,除了粤方言之外,在南方还有:吴方言、赣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等。当然,它们都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地方变体而不是互不相干的独立语言。不过,从言语交际、语文教育的角度考察,其特性则无异于双语制。在我国,汉语方言地域辽阔,文化底蕴悠久,是维系方言社区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际关系的纽带,是汉民族语言文化的摇

篮;何况少数民族语与汉语普通话和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与少数民族语方言,汉语普通话与汉语方言,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多层级的语言现象,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双语制。根据我国这一语言事实及其语言文化状态,我们定义了符合我国语言文化内涵的双语概念,把“语言—语言类型”和“语言—方言类型”都纳入了双语制范畴。就是说,“汉语普通话—少数民族语”“汉语普通话—外国语”(语言—语言类型)是双语制,“汉语普通话—方言”“少数民族语—方言”“外国语—汉语方言”(语言—方言类型)也是双语制。我们把“语言—语言类型”双语制称作传统的或狭义的双语制,把“语言—方言类型”(包括少数民族语—方言)双语制称作广义的双语制。这样定义双语概念,有利于我国双语制的研究与发展,为开拓社会语言学新领域,创建双语双方言学科奠下基础。十年来双语双方言研究的事实已经证明:广义的双语概念不仅受到广大学者和有关部门的理解与支持,在某些方面还起着消除推广普通话工作中负面影响的作用,而且,双语双方言理论与方法论拓宽了研究汉语方言现象的视野,使双语双方言研究事业得以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一成果的取得,“标志着我国的双语双方言研究已经发展成为语言学的一门富有时代气息的学科”^②。

双语同双方言联系起来研究,是深港语言研究所在国内外学者的支持下,从1987年开始的。我们以为:双语双方言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汉语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是语言文字现代化的基础,是国家文化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钱学森教授曾指出:“电子计算机软件也是语言文字工作”。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已在国际计算机软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今天,汉语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双语双方言是时代潮流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使它们更好地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发挥作用”^③。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把中文信息处理纳入语言文字

规范化、标准化轨道,十分必要;开拓双语双方言研究领域,使汉语语言文字更好地发挥协调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作用,在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生活诸方面积极影响社会的发展,更是责无旁贷。我想,遵循语言内部发展规律,深入开拓研究,为国家语言规划提供有效的科学数据,使双语双方言积极地服务于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缩短汉语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应该是双语双方言研究的首要任务。为完成这一首要任务,我们在研究策略上既十分重视宏观问题(理论探讨),也十分重视微观问题(技术操作)。深知处理好这两个关键问题,才能使双语双方言研究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开拓更深层次、更为广泛的研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所谓宏观问题,指的是全面了解、正确面对我国国内的语言事实,据此制定有关的研究规划,有步骤地调查国内语言状况,为提高双语双方言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水平、开展有效的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根据资料综合分析,中国境内存在着汉语和少数民族语,在某些领域存在着汉语、少数民族语和外国语并存分用的语言现象,这属于“语言—语言类型”双语制;在汉族广大地区存在着普通话和汉语方言,在汉族同少数民族接壤地区存在着普通话、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并存分用的语言现象,这属于“语言—方言类型”双语制。而在广大的方言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着汉语方言和汉语方言、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方言并存分用的语言现象,这属于“方言—方言类型”双方言制。两类双语制和一类双方言制的存在,是我国当前的语言事实。这是我们制定双语双方言研究规划的基本依据。从宏观的视角着眼,双语双方言要研究的是: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以及语言文化教育,为国家语言立法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如汉语地区和少数民族语地区)语言文字和语文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客观依据;对外

汉语教学,建立科学的汉语(普通话)等级测试制度,提高标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水平,以适应国际“汉语热”的需求。宏观问题带有战略性,其核心是处理好同微观的关系。换句话说,研究规划是否可行,其理论和方法论是否正确,直接影响着双语双方言研究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这是我们之所以十分重视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

所谓微观问题,指的是要在宏观战略规范下,运用双语双方言研究理论与方法论,对单语或单方言进行具体的调查与研究。

我国是一个语言和方言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尤其是方言资源。就汉语来说,我国有八大方言区,各方言区还有次方言。全国究竟有多少次方言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相信数量是不会小的;而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却为世人所共识。其实,汉语方言的分歧古已有之,先秦、汉代有的典籍、著作对此也有记载。如《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许慎《说文解字·序》:“诸侯力征,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而且还进行过方言土语的调查,“原来周秦之世,天子常在每年八月派遣‘輶轩使者’坐着轻便的车子到各地搜集民间方言土语,‘还奏籍之,藏于秘室’”^④。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下称《方言》)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调查集。这部专著记录了周末和秦汉时代的不同诸侯国的方言语料 11900 多字,涵盖了当时宋、齐、楚、秦、晋、赵、魏、燕等地(诸侯国)的方言。从《方言》所搜集的语料可以看出先秦时代各地方言的差别已经相当大了。《方言》对因地域不同而意义各异的方言词语进行了平面描写与解释对比。扬雄的研究方法,除了侧重于静态的平面描写之外,同双语双方言研究的方法已经相当接近。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微观问题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动态与静态的关系。从微观的视角着眼,双语双方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单语和单方言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即研究言语交际过程中互相撞击所产生的各种语言现象,并从中归纳、提升出带倾向性的规律来;同时进行静态描写,以单语或单方

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系统作为参照系,为有效研究双语双方言现象打下坚实的基础。这里要指出的是,强调双语双方言研究必须进行实地考察,着重调查单语或单方言之间活的人文背景和周边的语言状态,即言语交融过程的动态关系,着重描写并比较它们的内部结构及其同邻近语言/方言的异同,为的不只是它们自身的结构系统,而是为了确定调查对象语言谱系的归属:是独立的语言/方言,还是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混合型”新语言/方言,为了获取预测语言发展趋势的详细语料。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双语双方言研究理论,就确定不同方言临界带之间某个方言的谱系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比如,曾经有过争论的湘、鄂、赣临界带之间的某方言归属问题,如果从双语双方言研究的角度去考察,并采用双语双方言研究理论与方法论进行调查、比较分析,相信会很快得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来的。

由于大力推广普通话,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南北语言大交流,我国的双语双方言区在不断扩大,双语双方言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像上例一样有“方言归属”问题的方言相信不在少数。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拓宽双语双方言研究的地域范围,对新兴城市和农村,像深圳、上海浦东以及三峡移民地区的城乡,进行双语双方言现状的实地调查,并根据调查所得语料和研究结论,对该方言所在地区的语言发展趋势作出科学预测。凭着语言发展趋势的预测,国家在制定不同时期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的时候,就有了客观依据。根据我国的语言事实和现状,我们以为应该加大双语双方言研究的力度,有规划有步骤地设立“语言发展趋势预测点”,全国范围内有条件建立预测点的双语双方言区要尽早建立,形成东西南北中网络,以发挥预测点的宏观作用。预测点越多,国家制定颁布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就越符合我国当时当地的语言实际,就越能受到社会诸成员的拥护,就越能缩短汉语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诚然,要使预测点发挥宏观作用,必须建立全国计算机联网中心,把“东西南北中网络”纳入计算机互联网,让双语双方言研究成果、预测信息成为共享资源,以